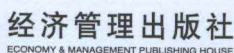


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

Study on Financial System Transi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 •

本专

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

Study on Financial System Transi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边俊杰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边俊杰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96 - 1633 - 8

I. ①明… II. ①边… III. ①财政制度—经济史—中国—明代 IV. ①F81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4595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责任印制: 杨国强

责任校对: 曹 平

720mm × 1000mm/16

14.5 印张

277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5096 - 1633 - 8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前 言

本书主要研究了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1368～1644年），包括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背景、过程、效应、成因以及启示与教训。封建皇权社会背景下的明代财政制度与当代财政制度有较大的区别，体现在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和财政管理等多方面，但无论有何区别，历史的资治借鉴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如在如何避免历史周期、如何总结历史兴衰的成因、如何改革当代财政制度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研究成果丰富，从研究内容看，零散的研究较多，系统而全面的研究较少，而且从民生的角度整体把握财政制度变迁与明代兴衰转换关系的成果更少，研究视角需要进一步拓展；从研究的方法看，应用传统历史研究方法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应用现代经济学，如制度经济学、经济史的计量方法、现代财政学等相关研究方法的成果较少。这是本书研究的逻辑起点。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汉民族建立政权的封建王朝。明初建立了轻徭薄赋、加强监管、安定民生、休养生息的财政制度，并实现了“洪永仁宣之治”，土木堡之变以后，明代开始走向衰落，财政制度也逐步退化，张居正改革只能救一时之弊，社会痼疾难治，最终失败。崇祯年间，明代最终被清王朝所取代，体现了完整的“历史周期率”。同时，自朱元璋“废相”以后，封建皇权达到了专制社会的顶峰，无论是财权还是行政权，都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而内阁、六部、司礼监、布政司、府州县等中央和地方机构都是最高皇权的执行者，在财政制度中，起运与存留则是反映明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主要内容，随着明代的变迁，在财政支出、赋役制度、财政管理等制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明代民生和历史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基于上述明代财政制度由建立到崩溃的历史演变过程，本书从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理论、背景入手，对财政制度相关理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明代财政制度的历史地位、特点和运行体系，指出了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四个阶段。本书将明代财政制度进行整体把握，按照变迁的内容—变迁的效应—变迁的成因—启示与教训这一模式和框架进行了深入研究，其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



(1) 明代财政制度在不同阶段进行了怎样的制度改革与调整？

(2) 不同阶段的财政制度对明代民生、国势、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3)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代前期制度有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代后期财政制度崩溃？

(4) 对当今中国的财政制度改革有什么启示和教训？

在这一分析模式中，本书不仅采用了传统的历史归纳法，而且采用了新经济史研究方法、经济史的计量方法和动态比较法，既有实证分析，又有规范分析。从实证方面看，主要是史实、理论、计量的实证；从规范分析看，发挥明代财政制度变迁对当代的资治作用，从中有所启示，吸取经验教训，需要有一个价值判断标准。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会得出不同的启示。“三个有利于”标准和重视“民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主要价值观。

从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内容看，其发展变迁轨迹与以往朝代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表现在：在明代初期，在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治国理念下，实施了整顿“两税法”、整顿徭役、优化支出结构、严格管理等措施，此时的财政制度相对较好。宣德以后，财政制度逐渐退化，尤其是正统、成化、天顺、弘治、正德等朝，在赋役制度上，税负不公的缺陷暴露，徭役复杂化，由此发生了加耗均赋、官民一则、折银减赋、均徭法等一系列的制度调整，但在支出上，皇室俸禄、宗藩俸禄、文武官员俸禄等迅速增加，用于民生的支出如社会救济、水利建设等支出被逐步侵蚀相对缩减，支出逐步膨胀和腐败增加使财政管理成本上升，同时宦官开始染指财政。赋役制度的混乱和支出的无序导致了财政危机日益加重，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里程碑意义的财政制度改革——张居正改革，这一变革体现了财政制度由量变到质变的实现过程，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一条鞭法、均田丈税，开源固本、精简冗员，节省支出、考成法等。张居正死后，人亡政息，改革失败，日渐好转的财政制度重新被破坏，赋役制度混乱，“三饷”加派严重、皇帝奢侈腐化，挤占国家财政、军费支出膨胀、监督审计机制败坏，明代财政制度最终走向崩溃。

在研究了变迁的内容以后，本书深入研究了制度变迁的效应。从民生“拔羽”效应、经济绩效、国势变化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明代财政制度走向崩溃的过程，是明代政府向人民“拔羽”的过程，通过对历朝包含“暗税”的人均田赋负担的演化分析发现，明代百姓负担逐步加重，通过明代百姓不同时期消费水平变化图可知，随着消费水平和税负的加重，民生最终得不到保障，引发了农民起义。从不同财政制度阶段的经济绩效看，由于赋役负担的加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逃户”增加，通过简单的计量模型分析结果证实，人均田赋负担与生产要素——人口呈反向关系，经济绩效下降是显著的。另外，随着制度的崩

溃，财政保障职能逐步消失，相应的明代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控制能力、社会稳定能力逐步弱化。从明代的国势变化看，财政制度退化、走向崩溃的过程进一步推动了其国势日渐衰败，在“北虏南倭”、“官腐兵弱”、“烽烟四起”的社会状况下，明政府则显得力不从心，最终走向灭亡，重新陷入了“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我们通过博弈模型的分析得出基本结论：明代财政制度退化、走向崩溃，究其原因是封建主义的根本制度缺陷造成的，具体体现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皇帝怠政、宦官专权、政治分化、腐败与陋规、货币制度难以配合等因素严重影响了财政制度变迁的正常轨道。皇帝怠政导致的宦官专权、政局混乱、财政文化被浊化等，以冲突、强制的形式冲击着明代的财政制度走向。白银货币化趋势对明代财政制度变迁具有诱致性的影响，但由于货币制度的演化存在缺陷，在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使赋役制度本身违背了效率原则，使改革逐步失效。

本书最后总结了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启示与教训。财政制度决定国家兴衰、“乱常生于治之时，危常起于安之日”；“怠政则患成，勤政则政兴”；权为民所用，并被民监督；推动财政制度变迁必须明确财政制度的优劣与成效的评价标准、财政制度改革应将经济盛世推向百姓盛世、财政权益的配置要以民生为原则、财政制度改革必须有配套制度配合、财政制度的良性变迁须有良好的财税文化。在财政制度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上主要有：治财先治官、制度建设应标本兼治、制度的推行应因地制宜、制度设计应避免“政府创租”等。

综观研究过程和结论，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

(1) 结合明代“历史周期率”，系统论述明代财政制度由好变坏，由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

(2) 提出了对财政制度变迁内容的新看法，如本书在论述一条鞭法时，创造性地做出了四个“条鞭图”，得出了一条鞭法改革事实上是治标不治本的非民生改革的结论。

(3) 通过经济史的计量方法，计算出了明代不同时期人均田赋负担的变化情况，并引入了“亚财政”负担，同时进行了“亚财政”负担的估计。

(4) 阐述不同财政制度下的经济绩效时，用 Eviews 软件对明代不同时期人均田赋负担与生产要素——人口作了简单的计量分析，并引入了“财政能力”概念。

(5) 在分析制度变迁的成因时，建立了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模型，通过制度变迁的 Polya 过程分析了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过程。

(6) 在启示与教训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财政制度改革应将经济盛世推向百姓盛世、财政制度的良性变迁须有良好的财税文化等。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
二、文献述评	12
三、本书的研究范围、对象和方法	23
四、本书的研究框架和创新之处	25
第二章 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研究的基础理论	29
一、基本概念界定	29
二、中国传统国家理财理论	39
三、指导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研究的当代理论	44
四、财政制度变迁的评价标准	49
第三章 明代财政制度变迁概览	52
一、明代财政的历史地位与特点	52
二、明代财政运行体系	60
三、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阶段划分	68
第四章 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内容	73
一、明初财政制度的创建	73
二、财政制度的退化	85
三、明代财政制度的变革阶段	102
四、财政制度的崩溃阶段	112
第五章 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效应	122
一、财政制度变迁的民生“拔羽”效应	122



二、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社会经济效应	137
三、明代财政制度变迁与明代国势变化	148
四、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历史周期率”效应	154
第六章 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成因	157
一、成因总览——模型透视成因	157
二、明代前期有效财政制度的成因分析	165
三、明中后期财政制度退化与崩溃的成因	168
第七章 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启示与教训	193
一、避免“历史周期率”的启示与教训	193
二、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启示与教训	197
三、明代财政制度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202
参考文献	209
后记	221

第一章 导 论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一）选题的背景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制度建设借鉴历史服务当前的重要性，他们围绕“制度”这一核心开始深入研究，而制度的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财政也是如此。从现实角度讲，指导我国的财政制度改革也需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温家宝在2008年3月18日答记者问时说：“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历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可以看出，国家领导人在施政过程中注重总结历史，服务当今，为我们在财政研究中发挥历史的资治借鉴作用指明了方向。

从选题动机看，除了大背景外，之所以选择明代财政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内容，还有如下原因：

1. 明代财政对当代财政借鉴意义重大

一般而言，距当代越近的历史对当代影响和借鉴作用越大。既如此，有人即问：“为何不研究清朝？它距当代最近。”在此，有必要交代以明代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

（1）明代在中国财政史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断代角度看，明代与清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代相比更具完整性。一方面,清代离近代虽近,但清后期外敌入侵,打乱了中国历史的演进秩序,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仍处于半殖民地社会,国家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这属于国际关系间的历史教训。就国家独立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而言,明代盛衰变迁是一个完整的“历史周期率”^①。选取明代来研究“历史周期率”,有益于政权的保盛防衰,对当代的借鉴意义重大。

明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秦汉宋元,下启清朝,其财政制度几乎囊括了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制度变迁的绝大部分成果,如财权集中于中央,财政状况的变迁都经历过盛→衰→改→崩的进程。清朝的财政制度框架是以明代的财政制度框架为基础的,在实质上并未出现大的创新,只是一些制度的修补。孟森在其《明史讲义》中曾对此作了简单概括:

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孟森,2006)

又言:

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过差。(孟森,2006)

可见,研究明代财政制度变迁,可以更好地理解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等问题,对于我国目前的财政制度改革的长远战略性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这是本书选题的主要理由。

(2) 明代的历史地位重要。事实上,上述表述已经表明了明代的历史地位,在此,从经济、外交等角度进一步阐述。

明代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国力、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可与汉唐媲美。清朝康熙皇帝南下金陵时,耳闻目睹南京城的盛况后,对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由衷地赞叹,并题“治隆唐宋”匾。这不仅是对朱元璋一

^① “历史周期率”又称“兴亡周期率”,最早见于毛泽东和黄炎培的谈话,黄炎培(1946)在《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来延安)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个人的称赞，更是对整个明代的称赞。

明代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在其前期，国力强盛，扬名海外。永乐年间，北京城的营建、南北大运河的沟通都是当时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体现。而郑和七次下西洋将明代经济的繁荣、文治武功传播至海外，充分展示了明代的综合国力和面向世界的开放精神，展现了当时中国所拥有的高超造船技术和先进的航海知识，体现了强大的军力、充足的物资和丰富的商品。中国封建时代在海上扬威海外的壮举一举“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强国地位”^①。《明史》卷332对当时的明王朝的强盛作了深刻评价：“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四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顙称臣，献琛恐后……而四方奇珍异宝，名禽殊兽，进献上方者，亦日增月益。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

在社会经济上，明代的农业产量超过宋、元，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纺织、瓷器、铸铁等生产规模和技术迅速提高。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又进一步促进了城镇规模和数量的扩张，开创了一个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崭新局面。“田野辟，户口增”，明代社会经济逐步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延伸，对整个明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编户1600万户，全国人口6000万口，已经超过了元代最高数额，比宋朝前期也高出许多。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面积850余万顷，比宋真宗时期的524余万顷也高出不少。”（张显清，2003）明代社会经济在当时世界上都占据了重要地位，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曾描述当时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1000年为22.7%，1500年为25%，1600年为29.2%，1700年为22.3%。明王朝从1368年建国至1644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经历了由22.7%到25%再到29.2%的上升过程。

明代文化灿若星河，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最为活跃开放的一个朝代，思想家无论数量还是级别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如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和同时代的西方先进政治思想家相比，可以说绝不逊色，基本上处于世界的前列。又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科技成果达到了历史新的高度。还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所表达的各种思想，尤其是赋税、理财思想，对当今都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3）明代有其自身的特色，值得我们去研究。有明一代，废除宰相，皇权加强，宦官专权；对外国力由强转弱，国土面积较元代缩小；在此时期，西方国

^① 张显清：《明代政治史》（上），人民出版社，2003年。



家开始变法图强等，因而备受关注。长期以来，提到明朝，人们都用“封闭”、“落后”、“黑暗”、“极端专制”等词加以形容。从明代财政制度看，黄仁宇在用他的大历史观评价明代财政制度时，也用“消极”、“僵化”、“倒退”等词加以概括^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众多学者研究的深入，对明朝强烈否定的看法逐步开始改变，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治亭就认为“这种说法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李治亭，1999）。事实上，明代有众多方面值得肯定，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毛佩琦认为，明朝是一个“极致”朝代，既不封闭，也不落后，完全当得起“治隆唐宋，远迈汉唐”这八个字。在笔者看来，无论是明代的腐败、宦官专权、高度集权，还是其商品经济发展、郑和下西洋等方面都有值得研究之处，无非是经验与教训的差异而已，需要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待它，不能一概地否定或肯定。如明成祖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就值得我们用财政的角度去研究。当时明朝依据强大的财政实力造就了很强的军事实力，同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在郑和下西洋期间，注重国家之间的交流，和睦相处，和谐平等贸易，得到众多国家的尊重和认可。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作为礼仪之邦，展现出了不称霸、不掠夺的大国气质。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经济实力大大提高，财政实力也相应地提高，用以发展各项事业的财力得到了保证，以日本为首的西方国家就抛出“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强大将对世界产生威胁。郑和下西洋的事实正是有力地反驳“中国威胁论”的佐证。可见有众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2. 与明代财政制度研究的不解之缘

在此，还需交代本书选题的另一动因，2006年笔者有幸参与了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史》一书的编写工作。在此期间，通过对众多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了解了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财政制度的变迁状况，深刻地理解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财政制度的内在规律和特点。这一经历激发了笔者对财政史研究的兴趣，进而又阅读了导师所著的《中国财政通史》（明代卷）一书，从此奠定了研究财政史的方法论等方面的基础。巧合的是，笔者在学习期间深刻地阅读了黄仁宇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读完以后对这本著作独到的分析感慨之余，也产生了疑问，明代财政制度真的如黄仁宇所说那样存在众多的批判？带着疑问，开始了对明代财政史料的搜集，形成了系统的综述，对明代财政制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发现对明代财政制度的研究深度是远远不够的，因而笔者试图以此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弥补研究的不足，通过研究吸取对时代发展有用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当前财政制度变迁问题的解决尽一份绵薄之力。

^① [美]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



（二）研究的意义

1. 理论意义

邓小平指出：“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①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当今研究中，我们重视今人、外国人当前对财政制度的研究，对前人的财政制度研究还不够，而前人的研究对当代的指导意义不言而喻。如前所述，明代在各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从理论的传承看，中国财政制度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离不开对历史的探索。创新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对历史的一种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马克思说：“人们创造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利用历史文明成果，在其基础上的发展创新，不仅体现了人类对历史的传承，更体现了新理论的适应性，研究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有益于深刻认识国情，在改革中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另外，从制度层面讲，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诺斯，1990），它是用来约束人的行为的一种规范。对财政制度而言，财政制度是约束政府等主体行为的一种规范。作为财政制度必须建立在经济层面财政行为之上，因为，财政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它“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目标”^③。财政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范畴，财政是国家一切政务的基础，国家政务的兴衰、好坏都与财政互为表里，它决定着社会随时演进的方式和趋势。制度的背后就是具体的行为，因而研究财政制度不能脱离财政行为空谈制度，也不能脱离政治空谈财政。变迁，即为情况的变化与转移，财政制度变迁即为财政制度的变化与转移，体现为具体规则的变化，表现为财政行为和政府行为方面。从这个角度讲，财政制度变迁不仅表现为某时期的财政改革，还表现为财政制度的演变过程。

改革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制度的演化却能让我们洞悉一个社会或政府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走向。那么，什么是财政制度变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财政制度变迁？历史上的财政制度是怎么具体展开变迁的？这种变迁的效果如何？如何评价这种变迁的效果？对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何借鉴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正是我们现在研究财政制度变迁研究的主要线索。

遵循上面的线索，对明代财政制度进行分析，应用现代财政学、经济学、政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

③ 陈共：《财政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治学、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考察明代财政制度变迁，进而探寻明代政府兴衰转换的过程，对我们从民生的角度深刻地探索避免历史周期率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2. 研究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现实意义

(1) 明代财政制度在帝制财政中具有完整性、代表性，对当代财政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恩格斯指出：“人类历史……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阶段，并通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① 本书的研究也是如此，通过研究明代的财政制度变迁，解释明王朝兴衰转换关系，为当代提供资治借鉴作用，这就首先涉及避免“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本书在前面已经提到“历史周期率”这一名词，并作了相应的阐释。为了更明确地说明明代财政制度变迁与明王朝“历史周期率”的演变过程，在此有必要深入的解释。

“历史周期率”作为我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规律，历代王朝从建国之初都力图保持自己的江山永固，长治久安，于是，王朝开始就吸取过往朝代灭亡的教训，励精图治，苦心经营，形成“治世”、“盛世”，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矛盾发生改变，最终礼崩乐坏，“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②，社会演变成“乱世”、“衰世”，进而改朝换代，进入下一个治乱循环。孟子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③，就蕴涵着“历史周期率”的思想。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鉴于春秋之乱、战国争雄的教训，推行郡县制度，并加强中央集权，改王称帝，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并自称“始皇帝”，希望从他开始，“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④，说明秦始皇当时的梦想是让他一手创立的秦王朝永垂万世，永不衰落，但事实上秦王朝仅经历了二世就灭亡了。自此，中国历史便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治乱循环。1946年，黄炎培在与毛泽东谈话的时候，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这一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届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这一规律，力图借鉴历史，通过完善自身的制度来跳出“历史周期率”。

如前所述，明代有完整的历史周期率，在这一历史周期中，无论从政治还是从财政制度看，不仅有温家宝所讲的“惊心动魄”，从中还可以看到明代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皇帝丧国，明代整段历史所反映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变化所表现的“公平正义”状况的好坏。自洪武皇帝“废相”之日，就展开了明代财政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与明代财政制度建立相伴随的是明代传统政治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② 《左传·庄公十一年》。

③ 《孟子·离娄章句》。

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走向高度集权。明初，洪武皇帝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吸取前朝经验教训，重视民生，休养生息，到明成祖时，财政充裕，国力强盛，才有郑和下西洋之壮举。但是，国内政治却日益黑暗，自“蓝玉案”、“胡惟庸案”始，便用严刑酷罚来重典治吏，“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终明之世，廷杖逮治不绝书，其残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①。到了仁宣时期，官场紧张气氛稍有缓和，但财政制度缺陷开始显露，税负不公之态日显，虽经历了宣德改科，但仍未解决税负不公问题。而至明英宗时期以后，皇帝怠政，明代政治便开始日益腐化，阉党乱政的局面由此开始，诸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历史上有名的阉党乱政，宦官专权，使明朝政治渐废，官场风气浑浊，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冗官冗员加大了财政负担，国力下降，田赋制度、经济制度相继崩溃，正如钱穆所言：“明世财政，自英宗以后即告黜。”（钱穆，1996）与此同时，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毫无公平正义可言，民不聊生。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为改革弊政，实施“一条鞭法”，整顿官风，财政状况和官场风气有所改善，但这仅仅是昙花一现，改革最终失败，张居正最后被抄家，落得惨淡下场。万历后期，“税盐四出，无税者起税，无所谓额，阉人横行，有司稍计民命，即奏于重谴”（孟森，2006）。物极必反，最终明朝政治演变成“党争”之祸。到了崇祯时期，国家财政制度功能基本消失，政府控制能力下降，社会经济遭到破坏，财政收支结构、社会结构失调，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贫富差距过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②，导致流民四起，全国大规模起义便敲响了明王朝的丧钟。有明一代，在盛衰转变的过程中，有不少有志之士力图改革弊政，改善民生；或挽救王朝命运；或举起“公平正义”大旗与阉党对抗；或居官清廉，为民谋利，不同流合污，这些人如张居正、于谦、方孝孺、海瑞、袁崇焕等，但最终都以悲惨收场，可谓是惊心动魄。在当代，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大大增加，政府更加关注民生，盛世治世初步显现。但不可否认我国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腐败之风也频繁发生的现实，进一步实现公平正义迫在眉睫。摆在政府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落实以民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让人们充分享受到改革以来的成果，维护公平与正义，以避免重蹈“兴衰周期率”之覆辙。回顾明王朝的整部历史，我们可寻求到值得总结的经验与教训，虽然帝制财政与现代公共财政有所不同，但治国理财的理念是相通的，因而可以为现代财政制度变迁服务。

（2）明代财政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资治作用。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资治作用有很多，比如说：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 （汉）荀悦：《汉记·武帝纪》。



1) 明代财政制度变迁中一条鞭法改革对当代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明代“一条鞭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里程碑式的赋役制度改革。这次改革的实施在明代经历了长期的积累过程，最终在万历初期发展到大规模的改革。换言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明代赋役制度变迁经历了一个缓慢到剧变的过程，宣德年间（1426~1435年）江南出现的征一法，正统年间（1436~1449年）江西出现的鼠尾册，天顺年间（1457~1464年）以后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成化年间（1465~1487年）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弘治年间（1487~1505年）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条鞭的特征。从嘉靖九年（1530年）开始，赋役繁重的南直隶率先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初，首辅张居正经过大规模清丈，在全国范围推行，并且进展比较迅速。推行“一条鞭法”，将明代原有的徭役，如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合并，摊派于田亩，编征时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即所谓“量地计丁”。这次改革的意义在于不只是税目的减少和赋役征收方法的简化，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即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和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这次改革最终失败了，并不彻底性，在实际操作中，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丁还须承担多寡不等的役银，人头税的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因而，才有了赋役合并的第三次改革，即清代雍正时期的“摊丁入亩”改革。

梁方仲在研究“一条鞭法”时，就曾经强调了一条鞭法对后世的意义：

两税法在明代实施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光景，到了明代中年（期），因种种关系，无法维持，渐为一条鞭法所替代。自此以后，直至清代、民国，我国四百余年间的田赋制度，大体上仍是继承着一条鞭法的系统，主要的变革甚少。所以我要研究现代的田赋制度，至迟不得不从一条鞭法下手。^①

2) 明代财政制度变迁中财政权益配置的变化对当代财政具有较强资治作用。有明一代，财政制度改革与变迁导致了赋役日益加重，财政民生支出日益被侵蚀，财政能力由高到低，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长远发展。这与历代王朝发展走势相似，从人民负担角度讲，王朝中期的赋役制度的每一次变迁与改革都源于缓解征纳双方矛盾激化的现实，但是每次改革都造成了人民负担的加重，加重的态势呈螺旋式上升。黄宗羲指出，赋税有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②，其中“积累莫返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在这里体现得更为明显。赋税改革时，将正税、杂税、附加税合并为正税，但时隔不

① 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

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华书局，1994年。



久，征税以外又出现新的附加和新税，形成“税外之税”、“役外之役”、“关外之关”。“一条鞭法”的实施，实际上是将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等合并为一项，加总征收，实质上是力差与银差与两税合并，为新增杂项腾出空间。此后，明末时期，加派、加饷又源源不绝。

明代中后期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社会地位配置财政权益，走向腐败，在对生产力产生破坏的同时，加剧了矛盾，造成国、民两伤，需要付出改朝换代的代价，对于当今社会具有较强的资治借鉴作用。

3) 明代官僚政治制度逐步恶化对财政制度的影响。就明代政治而言，“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①。总体看，自朱元璋废相以后，使封建皇权达到顶峰，政治制度的变迁呈现了高度集权的态势。主要表现在废相以后的宦官政治、中央与六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督抚州县的关系等。先看宦官政治，废相以后中书省政令归六部，并附之以内阁平衡和辅助决策，内阁拥有“票拟”权，宦官拥有“批红”权，相互制衡，然而随着皇帝怠政的局面愈演愈烈，宦官逐渐压倒内阁，出现宦官政治，同时内部出现了党争、“南北人之争”等政治斗争，恶化了明王朝的政治局势，对国家财政制度变迁具有破坏作用。从明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经过长时间的行政体制变迁，逐步形成了中央、布政司、府州县层级管理体系，地方布政使、总督、巡抚、知府、知州、知县负责地方政府事务，包括赈灾、推行财政制度等。他们对财政制度的推行具有重要作用，如宣德年间的“宣德改科”就是江南知府周忱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实施的，隆庆年间庞尚鹏为福建巡抚时改革财政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可见地方管理的效率直接影响财政制度的推行效果。开始时地方行政事务的处理具有一定的效率，但是随着官僚政治的腐败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混乱，中央逐步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财政制度无法实行。无论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混乱，还是明代官场的政治斗争，都是明王朝内部的内耗，内耗的结果则是忽视民生，民生状况的恶化成为了内耗的成本。

4) 财政文化浊化对明代财政制度变迁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再三强调：“丧乱之源，由于骄逸。”^② 鉴于“人情，贵则必骄”、“富贵易骄”^③ 的事实，有针对性地施行“右贫抑富”^④ 的方针。尽管在明前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官场日益腐化和明中期以后白银货币化，被压制已久的价值取向以“奢”或“淫”这一极端方式表现出来，官场风气、社会风气丕变，“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

②④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二。

③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一。